

# 由章学诚赋论引起的赋与寓言关系的思考

——以《子虚上林赋》为例

吴桂美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学界在论到赋的起源和生发时,多持《诗经》说、《楚辞》说、隐语说、战国诸子之文说等。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和《文史通义》中的赋论,也许隐含着另外一个观点:从对话形式、恢廓声势、排比谐隐、征材聚事等赋的论理表达、文体形式、题材艺术等方面来看,赋与寓言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赋的生发和写作应该也受到了先秦寓言的影响。章学诚赋论隐含的寓言与赋的关系的思考,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这是对先秦文学与汉赋关系的一点新的思考。

**关键词:**章学诚;赋论;寓言;赋体特点

**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2-0066-04

有关赋的来源,历代学者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清代学者章学诚也有个著名论断。他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说:“古者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属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sup>[1](P197)</sup>章学诚之论继承了班固、刘勰的观点,认为赋源于《诗》《骚》,同时又本着“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原则,指出了战国诸子之文对赋文体形式及艺术特点产生的影响。这一观点既有传承,又有开创,对后世赋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章太炎、刘师培等都接受传承了这一观点,此观点现在已成学界基本定论。因此,本文并不想对此做过多阐释,意欲探讨的是章学诚论断字面背后更有趣的一些东西。章学诚赋论中隐含的寓言与赋的可能性关系,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 一、章学诚赋论解析:寓言的聚焦

章学诚除了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中对赋有所论及外,其《文史通义·诗教》(上、下)中也有阐述。二者虽然出处不同,观点却一以贯之。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将《诗教》中的赋论关键语句摘录如下: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惠施之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非其质也。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诗教上》)

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诗教下》)<sup>[2](P60)</sup>

章学诚在《诗教》中的论述与《校雠通义·汉志诗赋》中的观点互相呼应。他认为后世文体在战国已经完备,汉赋无论何种形式,都可以在战国诸子之文中寻找到其源流。这是他的赋论基础。在这两处论述中,章学诚还细致列举了对汉赋产生影响的具体诸子文章,如苏秦、张仪纵横之文、《庄子》《列子》《孟子》之论、《韩非子》《吕氏春秋》之义等等。仔细玩味章学诚此语,可以发现章学诚在分析战国诸子之文对赋体产生的影响时,所引材料可用一个共同

收稿日期:2019-07-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荆楚文学家族研究”(17BZW123)

作者简介:吴桂美(1976-),女,湖北咸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唐文学、荆楚文化研究。

词语贯穿其中,即寓言。章学诚的赋论也许就暗含着另外一个观点:从对话形式、恢廓声势、排比谐隐、征材聚事等赋的论理表达、文体形式、题材艺术等方面来看,赋与寓言都有着重要的关联。

其实之前也有学者委婉提及寓言对赋的影响,却未引起学界注意,如王焕镳。他在《先秦文学著述四种》一书中认为:春秋战国期间,民间谐隐游戏非常流行,无论是谐趣故事或隐语,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中所论,“(谐)其辞虽倾回,意归正义也”,“(隐)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所以“这类有故事的隐语实际就是寓言”<sup>[3](P12)</sup>。王焕镳虽然没有直接表明寓言和赋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学界许多学者均秉持一个观点,即春秋战国时的隐语对赋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类有故事的隐语就是寓言”的论断,可以让我们推导出寓言对赋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但遗憾的是,王焕镳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在荀子《赋篇》隐语方式对赋产生的影响上,而并未对寓言和赋的关系做进一步阐释。

## 二、寓言与赋关系的解析

循着章学诚的赋论,结合汉代具体赋作,我们可以发现寓言与赋确实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子虚上林赋》是汉赋代表之作,我们就以《子虚上林赋》为主要例证,对寓言与赋的关系做一个细致的分析。

### (一)论理方式的相似性

章学诚指出,赋“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属也”。“问对”即“对话体”,“假设”即虚构人物、场景、事件,这正好是寓言和赋体的共同特点。先秦寓言有两种基本的文体形式,或依托于散文文本,或以独立的文本形式出现,但不论哪种形式,“假设问对”都是其基本的论理方式。

《庄子》《列子》之文为了将自己的学术观点更直观地呈现出来,在文中大量使用寓言。正如《庄子》自己所论:“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僇,不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sup>[4](P508)</sup>“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十九,藉外论之。”<sup>[4](P420)</sup>这也成为“寓言”这个词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文献记载。庄子认为“天下沈浊,不可与庄语”,因而“藉外论之”。大量使用寓言是他学说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动荡、思想分化、学术纷呈,诸子为推行自家学说,在那个功利时代,不得不采用通俗形象的寓言以说理。因此《庄子》《列子》等先秦著作中寓言的使用,是时代

要求和创作目的的结果。

《子虚上林赋》在表述形式上,也是通过假设人物,以及人物间的对话来表达观点。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评:“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sup>[5](P2289)</sup>汉代赋家虽然“位同俳优”,却都自命不凡,不甘于文学弄臣身分,积极用文学介入政治。正如《子虚上林赋》上下两篇,无论作于司马相如游梁之际,还是作于与武帝初识之期,都是为获得当政者赏识,并寄寓自己政治观点而作。景帝时期,司马相如本“以赀为郎”,但景帝并不爱好辞赋,使饱含文才的司马相如颇不得志。当梁王及其一批文学侍从来到京城后,他十分景慕,遂辞官随梁王去了梁国,并在游梁期间写下了《子虚赋》。十年后,当他意外获得武帝赏识,再次回到中央王朝时,政局的变化,点燃了司马相如内心的政治抱负,即欲以文学政治劝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眼界的开阔,政局的敏感领悟,思想境界的提升,让司马相如重新写下了《上林赋》,但文学侍从身分的尴尬,又让他不得不采取一种委婉的言说方式。

因作文目的的相似性,汉赋作家的赋文与春秋战国的诸子寓言一样,采用了相似的婉转论说言理方式:假设问对,意在讽谏。

### (二)文体形式的相似性

“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章学诚还以苏秦、张仪说辞为代表,论述了战国纵横之文对汉赋的影响。大多学者在阐释这句话时,普遍从纵横之文的言辞角度分析。确实如此,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之文,无论是言说之辞还是叙述之辞,都显得“辩丽横肆”,这与汉大赋“以大为美”“铺陈夸张”的特征一致。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曾说:“(楚辞)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而游说之风浸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如屈原同时有苏秦者,其说赵司寇李兑也,曰‘洛阳乘轩里苏秦,家贫亲老,无罢车驷马,桑轮蓬筐,赢滕担囊,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造外观,愿造于前,口道天下之事。’自叙其来,华饰至此,则辩说之际,可以推知。余波流行,渐及文苑,华辞繁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sup>[6]</sup>在文辞上与楚辞一脉相承的汉赋,与战国时代纵横家铺叙辞采的言辞和当时记录这些言辞的作品关系更是如此了。这一点前人论述颇多。

事实上,这些论述可能都未注意到,大量使用寓言说理也是纵横之文的特点,纵横之文的寓言同样具有描绘尽致、渲染淋漓的艺术形式。先秦寓言本为说理,然而为了增强寓言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尤其纵横家的游说之辞为达到游说目的,在论理形式上往往极尽言语之能事,更加注意情节的描述、形象的设计和语言的技巧,文字也渐趋华丽,注重表达气势,并喜欢用极度夸张制造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场面,以达到讽刺或寄寓的目的。《战国策》中的寓言“虎怒决蹠”(赵策三·魏魀谓建信君章)、“骥服盐车”(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虎将即禽”(赵策一·谓赵王曰三晋合而秦弱)等等,莫不如此。再如《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庄辛为了劝谏楚襄王吸取前人教训,励精图治,用了蜻蜓、黄雀、黄鹄、楚王命运一连串的比喻寓言,从小到大,由远及近,循序渐进地说明了贪图享乐必将导致国破身亡结局的道理。全文论辩气势磅礴,立意高远,是典型的纵横之文代表,也是《战国策》中寓言的典型代表。再来看《子虚上林赋》,其写作模式与《庄辛说楚襄王》寓言的文体形式及论理方式非常相似。《子虚赋》中子虚向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之丰饶,乌有先生不服,而以齐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等压制子虚。《上林赋》紧接二人之论,引出亡是公的天子夸饰,层层递进地夸张描写,以天子悔过反思,子虚和乌有先生向亡是公表示诚服结束。全篇大量使用对偶、排比,语言富丽堂皇,铺张扬厉。《庄辛说楚襄王》也是通过君臣问答,铺陈描写事物,辞藻夸张华美,生动形象,最后也以楚襄王的心悦诚服,端正行为而结束。所以有学者认为,《庄辛说楚襄王》的文体形式已与汉代的散体赋颇为相似。由此可见,《战国策》此类文章及其寓言表达,对汉赋的影响不容忽视。

### (三)表达方式的相似性

“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章学诚还论述到了韩非《储说》之文对汉赋的影响。他还认为“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连珠是一种短小精巧并以设喻方式说理的文章,兴盛于魏晋六朝时期。有的将之归于骈文,有的将之归于辞赋,章学诚明显持第二种观点,并且正是以连珠为桥梁来解析《储说》对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最早将“连珠”与“对问”“七体”一起收录在“杂文”中,周振甫在其《文心雕龙注释》中曰:“对问、七体、连珠,实际上都是辞赋。……连珠是比喻、事类的结合。连珠比较短小,一则一则可以各自独立,它们都通过比喻、事例来描写,具有辞

赋的特点。”<sup>[7](P156)</sup>简宗梧也解释了“杂文”:“所谓杂文,乃指辞赋家或非辞赋家,写文章、濡染了写作辞赋的习性与气息,崇尚辞气所以致之。换句话说,这是辞赋濡染了其他文章,产生新文体甚至新文类的现象。”<sup>[8]</sup>可见,不论文体归属究竟为何,连珠与辞赋关系都甚为密切,可以看成辞赋的一种,或者辞赋的变体。

在先秦典籍中,寓言最为丰富的莫过于《韩非子》,而《储说》就是《韩非子》一书中的一部寓言故事专集,甚至有学者认为《储说》是包括两百多则故事的一个巨大寓言群。<sup>[9](P58)</sup>在章学诚看来,《储说》与连珠都具有“排比谐隐”“比事征偶”的共同特点,而连珠是赋的一种或者辞赋的变体,这实际上隐含透露出《储说》中的寓言与赋共同具有“排比谐隐”“比事征偶”表达的相似性。

借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或者动物故事等寓言说理,是《储说》的最大特点。因借寓言表述观点,无论是总结经验教训,寄寓说理,还是歌颂讽刺,《储说》都显得诙谐隐晦,幽默戏谑,如“堂谿公谓昭侯”“尧欲传天下于舜”(《外储说右上》)、“齐桓公好服紫”(《外储说左上》)、“卫人有夫妻祷者”(《内储说下》)等等;并且因为具有严密的逻辑理论,《储说》里的故事都具有气势充沛和酣畅淋漓的特点。《子虚上林赋》的表达方式与之非常相似。《子虚上林赋》的排比修辞是其言辞的明显特点,因大量的对偶和排比,文章呈现出一种铺排气势,这不必多费笔墨阐释。值得注意的是,《子虚上林赋》整个故事叙述也是非常幽默有趣的,并且故事的最终目的在于说理,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谐隐”。先是子虚和乌有先生因诸侯之事相互竞逐指责,未想被一直旁听的亡是公所鄙夷。于是亡是公抛出一段天子之论,正当大家沉浸于天子上林的宏阔巨丽中时,亡是公又话锋一转,归于讽谏天子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整个故事叙述曲折回环,颇有喜剧效果。这种写作表达方式与韩非或者说先秦文学的寓言是极其一致的,即借虚构的人、物或事来阐释哲理,并喜运丰富的想象和夸张手法,让故事具有了幽默诙谐的特点。

### (四)取材方式的相似性

章学诚还从“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论到了《吕氏春秋》和赋之间的关联。《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在秦国政治、军事、经济都非常强大的基础上,欲在文化上与其他诸侯国一较高低的产物,又因出于众人之手,取材甚广,最后成了一本包揽“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与其他诸子之文一样,《吕氏春



秋》也大量使用寓言说理,这也成为《吕氏春秋》文学上的突出成就。而《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也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后用一个或几个寓言故事论证;或开篇引出若干寓言,结尾处归纳点明全文主旨。取材的广泛,寓言的群出,正是章学诚所谓《吕氏春秋》“征材聚事”的特点。如《先识览·察微》开篇,文章即提出了“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sup>[10](P21)</sup>的观点,接着连用“辞金受牛”“桑女败国”“羊斟御车”“斗鸡之仇”四个寓言故事,正反两方面论述开篇论点。又如《先识览·去宥》,开篇罗列了“唐姑果妒贤”“荆威王学书”“枯梧不善”“齐人攫金”几个寓言,层层分析之后,文末再点明“凡人必别宥然后知”的中心观点。这种取材形式对后来散体大赋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无论《七发》所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要言妙道”七事,还是《子虚上林赋》对齐、楚及天子“苑囿特产、宫室楼台、田猎张乐”的铺排描写,都与《吕氏春秋》“征材聚事”的取材方式和行文结构有着相似之处。

### 三、结论和思考

中国“寓言”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庄子》,但其含义与现代意义上的寓言颇为不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寓言概念主要还是接受了后来西方理论的影响。至于究竟什么是寓言,国内外学界始终没有一个统一论;但我们在此并不必过多纠结于寓言概念的明确界定,只须紧紧把握住寓言的基本特点即可。不论定义如何,虚构性、故事性、说理性或者劝喻性,是中西方共同认可的寓言基本特点。

从前面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寓言与赋在言说、表达、文体、取材形式等方面,确实有着很大的相似关联性,某些赋就可以看成是一篇寓言,或者说具有寓言的特点,如前面分析时举的例子汉赋代表作《子虚上林赋》。《子虚上林赋》完全符合寓言虚构性、故事性和说理性的特点。在《汉书·叙传下》中,班固有句话颇值得玩味:“(司马相如)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见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第二十七。”班固以“寓

言淫丽”评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虽然在颜师古看来,“寓,寄也”,“寓言淫丽”应该理解成《子虚上林赋》寄理的言辞过于华丽,这里的“寓言”也许并不是文体寓言意思,但结合上下文来看,“子虚乌有,寓言淫丽”,班固正好点明了《子虚上林赋》虚构性、故事性和说理性的特点。抛开文体既定观念,除去夸饰描述而外,精炼后的《子虚上林赋》的寓言特征就更为明显了。

春秋战国时期离汉未远,作为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一个重要文学特点,寓言势必对汉代文学产生影响。汉赋为汉一代之文学,理论上不会不受到寓言的影响,上述分析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而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慕蔺相如之为人”,仰慕梁王及其周围游说之士,这些记载都可以隐约看到战国文化对司马相如的影响。

章学诚赋论简洁精炼,但是他对历史进程中不同时代文学、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的论述,却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学界在论到赋的起源和生发时,多持《诗经》说、《楚辞》说、隐语说、战国诸子之文说等,章学诚赋论隐含的“寓言与赋的关系”则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赋的生发和写作也许也受到了先秦寓言的影响。由于笔者学识谫陋,本文论述非常浅薄,但由此引发的先秦寓言对赋的影响、先秦文学与汉赋关系的思考却有一定的意义,期待方家批评指正,并能对此话题展开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 参考文献:

- [1]刘兆祐.校讎通义今译今注[M].台北:学生书局,2012.
- [2]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 [4]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6]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 [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8]简宗梧.论王粲的赋体杂文[A].苏瑞隆,龚航.廿一世纪汉魏文学新视角[C].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
- [9]陈浦清.中国古代寓言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 [10]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下册)[M].北京:中国书店,1985.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